

梵语《悉曇章》 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周广荣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Fanyu Xitanzhang

Zai Zhongguo de Chuan
hexiang

梵语《悉昙章》 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Fanyu Xitanzhang

Zai Zhongguo de Chuanbo yu Yingxiang

周广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梵语《悉曇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周广荣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11

ISBN 7-80123-647-5

I. 梵… II. 周… III. ①梵语-研究②佛教-宗教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H711②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688 号

梵语《悉曇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周广荣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305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647-5/B·247

定 价: 28.00 元

专家推荐意见

佛教有五明之说,声明是其中之一。印度哲学又有语言哲学派,认为语音、语法具有哲学本源意义。印度的这一文化形态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如公认的四声的产生,诗韵的发展,切韵、等韵等中国音韵理论,乃至律诗的发展,无不与此有关。声明不仅是一种语言工具,它还直接影响佛教哲学,这在大乘,特别是密教中特别明显。因此,印度的声明在中国佛教中形成一门分支学科——悉昙学。悉昙学与佛教哲学的关系甚为密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然而,长期以来,对悉昙的研究,始终是我国佛教研究的薄弱环节。除了少数论文外,尚无系统的专著。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悉昙学在中国流传,演变的学术专著,作者下功夫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以佛教文化为背景,论述了悉昙学对中国佛教、中国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立论有据,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本书的出版,不仅改变我国在悉昙学方面的落后局面,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对佛教语言哲学、密教等研究,都有极大的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方广铝

专家推荐意见

悉昙学是梵汉两种语言文化相互交流的产物,也是佛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佛教传入中国到近代,以讲授梵文字母及字母拼合法的《悉昙章》为基础,探讨梵文字母知识和佛教义理两方面内容的悉昙学,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宗教等多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近代研究悉昙学的大家不少,但他们多注重专题性质的研究。这部《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则是第一部全面论述《悉昙章》从古代到近代传播途径、演变方式、影响范围及其文化价值的贯通性专著。本书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收集资料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考辨史料之精细,在本研究领域是没有过的。《悉昙章》主要是口耳相传,全面而集中的书面材料很少,大部分散见于数量庞大的各类古代典籍中。作者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务求其完备,仔细检阅了《大正藏》、《续藏经》、《中华大藏经》、《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等书籍,从中辑录出丰富的原始材料。在对这些资料的考证和辨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思想和结论。这种搜集、整理和考证史料的工作,不仅为本书立论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提出了系统的新结论,并且对学界聚讼已久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有资料支撑的新观点。例如,在探讨“悉昙”名义问题方面,指出悉昙学是中國人在研习《悉昙章》的过程中,掺入佛教义理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事理名数而形成的一门学问。在研究四十二字门方面,指出四十二字门是中国人最早接触的梵文字母形式,它

的传播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人对梵文悉昙字母进行认识与研习的方式。本书提出,以梵文五十字母为内容的十四音是最早传入中土的一种《悉昙章》。本书还通过分别讨论唐代法相、华严、天台、密、禅诸宗对《悉昙章》的传习状况,论证了各宗传习《悉昙章》的不同情形与方式。通过重点讨论中古时期文人对《悉昙章》的研习,揭示了等韵学、诗文声律理论、敦煌《悉昙章》歌辞等均以《悉昙章》的传播为条件而发生发展的事实。

总之,本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有启发和借鉴作用。本书资料翔实、准确,引证规范,结构严谨,文字通畅,表述清楚。对于一位青年学者来说,撰写出这样的高质量著作,已经充分体验了科研工作的艰辛,表现出不浮躁、不逐利的可贵学术品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魏道儒

序

悉昙学是一门冷僻的学问。它以作为梵文字母拼音教材的《悉昙章》为主要对象,研究有关梵语的历代学说以及其中蕴藏的文化内涵。本书在悉昙学研究中又属一个较为专门的分支。它不是从一般知识的角度关注悉昙学,而是把悉昙学看做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具体个案,由此来考察它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的文化意义。从“意义”角度看,这个传播过程的每一点细节都是饶有趣味的,比如,在中国人看来,“悉昙”指的是什么?《悉昙章》、悉昙体、悉昙学之间关系如何?“悉昙”为什么会成为一门富有文化内涵的学问?它如何传入中国?以何种形态被素无字母知识的中国人接受?在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悉昙章》又对中国的宗教、文学和语言学产生了什么影响?——具体地说,它如何影响了永明声律、南朝“十四音”、唐代民歌中的“鲁流卢楼”、宋代等韵学等等事物?凡此种,都可以说是“一沙一世界”,是内容丰富而引人入胜的。不过,在接触这些知识之前,读者或许愿意从另一面想想:作为一个年轻人,本书作者为什么会注意这些专门的问题,并因此而走上艰苦的学术道路呢?这也是一件值得谈论的事情。

此事可以追溯到1996年春天。那时,本书作者周广荣只有二十五岁,刚由湖北大学研究生毕业。他以博士研究生候选人的身份来到扬州大学,其时我正好在这所学校主持中国古代文学博士

点的工作。看见这位朴朴素素、稚气未脱的年轻人,负责招生的老师们不免有几分喜欢。后来四场考试结束,他的专业成绩虽不如几位年长的同学,但外语成绩却遥遥领先,大家便不约而同地看好他了。这时候,我开始萌生一个心愿,想指导他进行一项语言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

这时我已经招收过两届博士研究生了,学生都是我的同代人。或许由于清代扬州学者留下来的通识传统,或许由于从学术界到研究者本人都有跨学科发展的需要,这时,有好几位同学选择了“汉民族文学与其它文学艺术的比较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其中来自云南的王胜华,已结合中国南方各民族的表演风俗研究了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来自新疆的赵塔里木,打算搜集整理东干人(19世纪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西北中国人)的民歌资料,进而研究陕甘宁民歌经新疆向中亚地区的传播;从加拿大访学归来的傅修延,则参考西方的叙事理论和叙事史研究,正在考察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而在此之前,我也研究过随佛教东传而发生的中国文体的变化,并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对各民族的文学艺术作了长时间考察。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来说,我们这些学术经验是有新鲜意义的,因为它提醒人们:只有通过跨文化的比较,才能真正认识汉民族文学与艺术的特质。只有注意考察长时段的现象,才能揭示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文学现象中最具民族性的因素、最具长时段特质的因素是形式因素,因此,应当从文体的角度去阐明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国文体总是在外来因素的影响下更新的,由于丝绸之路的缘故,这种外来因素主要源于西域,因此,中国文学史著述应当重视对中西文学艺术交流进行描写和解释。在我们看来,这些认识都是需要用进一步的实践来验证的。尽管

许多前辈史学家早已把目光投放到了边疆,投放到了作为文化变迁之动力的交流与传播,但我们所尝试的工作尚属学术的薄弱环节,因而具有前沿意义和远大前景。

1996年1月,周广荣来扬州报考前不久,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韵文的传播方式及其体制变迁》的论文。此文在研究一系列韵文文体成因的基础上,论证了文学传播方式对其体制变迁的直接影响。当它讨论到五、七言诗体的形成过程及其与乐府的关系的时候,它注意到七言诗体形成的关键是隔句押韵的七言诗的形成,其实质则是两种句式观念的过渡——前者认为六言、七言在节奏上相当于三言、四言的两句,后者则把六言、七言句式与三言、四言、五言句式都看成一个诗句单元。有趣的是:这种七言、六言同三言、四言、五言在节奏上对立的现象,以及这种对立的逐渐消除,同样见于中古的藏语诗歌。敦煌写本古藏文文献记载了一种六字(六音节)诗,其特点是每三字一停顿,凡第三字均为衬字“呢”,形成一个四音步的节奏;又记载了二十余首格言诗,都是七字(七音节)诗,四音步,“二、二、二、一”结构。可见六言和七言的相似是音步的相似,也就是说,在藏文诗歌中也有六言、七言作为对立的一面,三言、四言、五言作为对立的另一面的现象。而且,藏文诗歌也是在相当于南北朝至唐代的时候,把这一对立消除的。这和汉语诗歌消除上述对立的年代相近、原因也相近(它们都与西方传来的佛教文学有一定关联)。这种情况是发人深省的。它意味着:我们有必要作一项比较研究——通过中古时代藏语诗律、梵文诗律、汉文诗律的对比,来具体地阐释中国格律诗的起源过程。毫无疑问,悉昙学也将是这一对比研究的重要方面。因为成熟的七言体诗,较早出现在佛家韵文当中,例如南齐王

融的《法门颂》(一说谢灵运作)、《努力门诗》和《回向门诗》;而王融、谢灵运等人恰是在佛教转读和悉昙学的影响下,倡导音律研习、制造经呗新声的人物。

不过,尽管我不断被上述想法所激动,我却没有着手这项研究。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我不具备从事这项比较研究的能力。除英语、日语、东干语以外,我运用相关语言材料的水平,仅限于查阅藏文辞典。而且,我错过了学习外语的最好的时机。就在我为上述遗憾而惋惜的时候,年轻的周广荣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大家可以想想,这是一件多么凑巧的事情!我不由得产生了假手于人的企图。我想会有不少人能够理解我的企图。中国有一句话说“薪火相传”,又有一句话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前一句话,说明师生之间的关系是老树新枝的关系,是学术理念的传续;后一句话,则说明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前浪后浪的关系,是合作与接力。

周广荣并不是被动地走上梵学研究之路的。在着手研究之前,他经过了反复考虑和摸索,阅读了关于印度、西域、敦煌、音乐、佛教、道教等多方面书籍。他也不是轻松地进入学术之门的。从1997年春天开始,他和同时入学的博士生何剑平一起,在编写《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的名义下,分别通览了85厚册《大正新修大藏经》和106厚册《中华大藏经》。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也是学科转换的必由之路。周广荣深知这一点,因而进行得很艰苦,也很努力。到1998年夏天,当通读《大藏经》进入尾声的时候,他已搜集了数十万字关于佛教语言学和音乐学的资料。而更为重要的收获是:他熟悉了佛教经典,培养了对佛学和梵语言文学的兴趣,也掌握了大规模阅读资料、进行资料分类的方法。这样,他就在经过一番比较与选择之后,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选题。接下来,他仔细

分析了悉曇部的音乐史料,细致检讨了所能找到的关于印度语言学和西域语言的各种材料,认真考察了佛教所用语言的变迁,然后才展开了本书所涉及的各个论域。

1999年11月2日,论文答辩前夕,我曾就周广荣的学位论文提出了以下评审意见:

本文在通读汉文《大藏经》的基础上,通过对悉曇章的入华年代、发展阶段、传人和传本等事项的具体考订,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这部印度语言学典籍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为解决四声的起源、诗文声律理论与十四音的关系、敦煌悉曇章的作者与时代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选题新颖,结构合理,作风朴实,是一篇成功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意进行答辩并建议授予学位。

这段评语很短,但它涉及到了本书的几个重要意义:其一,悉曇学是一门随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形成的学问。它与佛典的翻译相始终,是佛教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本书填补了佛教史研究的空白。其二,悉曇学对中国语言学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影响到四声的发现、韵书体例的变化、字母的创制和等韵学的形成。这都是语言学界密切关注而未能完善解决的问题,因此,本书将对中古时期汉语言文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三,作为梵汉两种语言文化互相接触的产物,悉曇学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一个生动而具体的个案。对它的深入研究无疑会冲击关于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基本理论。也就是说,尽管本书出发于格律诗之形成这一文学史问题,但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

也许正是因为这项工作的上述意义,2000年初,周广荣幸运地进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成为一名博士后人员;2001年

年底,他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录用,成为该所的一名研究人员。在这四年里,他有幸见到更多更优秀的老师,接触到更好更开阔的语言环境和资料环境,因而学习了基础梵语,了解了印度语言文学研究、佛教研究等相关学科的规范,走进了佛学研究的大门。这期间,他围绕悉昙学研究进一步补充了三方面资料:(一)印度撰述,即佛典中保存的悉昙学史料,以及印度古代典籍中保存的可以与佛典互相发明的数据;(二)中土撰述,即中国僧侣撰述和佛典注疏中的悉昙学史料,以及外典著作中与悉昙学相关的资料;(三)参考资料,即今人从事悉昙学研究的成果。这使他视野更加广大,认识更加深入。比如博士论文中已经涉及到的四十二字门在印度的源流问题、博士论文中未作详论的明清时期悉昙学与等韵学的合流问题、近代密教之复兴与悉昙学著述之刊刻的关系问题,都以新的面貌成为他的考察对象。由此看来,本书实际上凝结了周广荣的青春,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成长。如果说,周广荣是在1996年走上这条成长之路的,那么,现在他正站在八方通衢的中央。本书所呈现的每一种意义,都有可能作为新的途径和新的生长点,把学术引入更加胜妙的境界。至于前文所说的中古梵、藏、汉诗律的比较研究,则有可能是其中最高的山峰。为此,我愿意以老树和前浪的身份,给广荣以深切的期许与祝福!

是为序。

王小盾

2004年3月3日于汉城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一、悉曇名义	(5)
二、《悉曇章》入华年代	(16)
三、材料来源	(27)
 第一章 四十二字门——梵文字母在中国传播的 最早形式	(33)
第一节 《大品》般若经论与四十二字门	(34)
第二节 《大品》般若经论的传习及四十二字门的传播 ..	(45)
 第二章 十四音——《悉曇章》在中土传播的早期形式	(54)
第一节 《大般涅槃经》的翻译与传播	(60)
一、《大般涅槃经》的翻译	(60)
二、《大般涅槃经》的传播	(64)
第二节 十四音遗说考	(83)
第三节 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说	(99)
第四节 梁武帝、真谛对十四音的讨论	(106)

一、梁武帝论十四音	(107)
二、真谛及其《涅槃经十四音》	(111)
第五节 慧远、吉藏、惠均等对十四音的讨论	(115)
一、慧远所传胡地《悉曇章》	(115)
二、吉藏论十四音	(119)
三、惠均论十四音	(123)
第三章 《悉曇章》在中土的传播(上)	(128)
第一节 法相宗对《悉曇章》的传习	(132)
一、玄奘及其所传《悉曇章》	(133)
二、窥基论悉曇文字	(141)
三、法宝论十四音	(145)
四、遁伦论悉曇字母	(147)
第二节 华严宗与《悉曇章》的传播	(150)
第三节 密宗与《悉曇章》之传习	(163)
一、善无畏所译《大日经》对悉曇文字的传播	(167)
二、金刚智所传金刚界瑜伽密法中的悉曇文字观	(170)
三、一行所传的密教《悉曇章》	(174)
四、不空所传“中天音旨”	(184)
五、慧琳对十四音说的批判及其对《悉曇章》 的规范	(190)
六、全真对悉曇文字的推广	(196)
第四节 禅宗与《悉曇章》的通俗化	(200)
第五节 天台宗的涅槃学及对《悉曇章》的传习	(210)
第六节 义净及其所传《悉曇章》	(219)

第七节 《悉曇章》传本叙录	(228)
第四章 《悉曇章》在中土的传播(下)	(240)
第一节 宋元时期的佛经译勘与梵字的传习	(242)
一、宋初的佛典翻译及其对梵字的传播	(242)
二、惟净及其《景佑天竺字源》	(252)
三、元代佛典的汉藏对勘与梵字的流行	(255)
第二节 明清时期悉曇学与等韵学的合流	(259)
一、赵宦光《悉曇经传》	(261)
二、刘献廷《新韵谱》	(271)
三、周春《悉曇奥论》	(274)
四、允禄等《同文韵统》	(280)
第三节 近代汉传密教复兴背景下悉曇学著作的撰述 及刊刻	(290)
第五章 《悉曇章》对汉语言文学的影响	(304)
第一节 《悉曇章》与等韵学的形成	(305)
一、关于等韵图中的一些基本概念	(306)
二、《涅槃经悉曇章》的时代与等韵图的产生	(313)
第二节 从南北朝文人与僧侣之交往看当时文人对 十四音的研习	(318)
一、南朝文人对十四音的研习	(321)
二、北朝文人对十四音的研习	(330)
第三节 唐代文人对悉曇文字的研习及其在诗文中的 表现	(333)

一、初盛唐时期文人对悉曇文字的研究	(337)
二、中唐时期文人对悉曇文字的研究	(344)
三、晚唐时期文人对悉曇文字的研究	(355)
第四节 从史实论十四音与诗文声律的关系	(364)
一、四声说的提出	(367)
二、十四音与永明声律说	(371)
三、十四音与宫体诗人对声律的追求	(383)
第五节 《悉曇章》歌辞及其影响	(387)
一、《悉曇章》歌辞的作者与时代	(388)
二、《悉曇章》歌辞的内容	(393)
三、《悉曇章》歌辞中的和声与《般若悉曇章》的作者 与时代	(396)
四、“鲁流卢楼”对后世民间曲辞的影响	(400)
参考书目	(408)
后 记	(421)

绪 论

十八世纪末期,梵语传入欧洲后,对当时欧洲的语言学、史学乃至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说它直接促进了近代比较语言学的兴起,推动了印欧语谱系理论的建立,那么,一千五百多年前,当梵语随佛教传入中国之时,它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呢?

梵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与各种欧洲文字一样,是由古埃及的楔形文字演变而来的。梵字重字音、字义而不重字形,有别于汉字注重字形、字义而相对忽略语音的特点。梵语传入中国后,由于宗教情绪的推动,中国的僧侣、文人往往将它视为佛教圣语去学习,同时自觉不自觉地以汉语作比较,使两种语言的不同特点在对比中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梵文重音的特点引起人们对语音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汉字当中的语音因素开始受到重视,由此兴起了研究汉语语音的学问——音韵学。如果说传统语言学中的文字学、训诂学是中国学术自足发展的产物,那么其中的音韵学则是在梵、汉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对语言研究的深入势必影响到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语音的自觉使文学创作开始有意识地追求诗文的声律之美。在这一过程中,梵语《悉曇章》起了